

理想之维与人文之光

——近年来军旅题材儿童小说综述

■陈香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逐步进入了繁荣发展的兴盛期,勃兴的势头体现在创作、出版、传播等各个环节。尤其是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儿童文学在思想观念、艺术手法、题材内容等创作本体层面实现了新的沉潜与突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21世纪初年,儿童小说大致存在着两股写作潮流,其一以传统的校园小说为主,其二以奇幻、魔幻、冒险题材为主。儿童小说在书写对象与题材内容方面进入了千篇一律、日益窄化的瓶颈,儿童小说创作的历史感、自由度亟待深化和拓展。在这种背景下,以革命战争历史和当代军旅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儿童小说逐渐兴起,阳刚雄浑的英雄叙事和崇高理想的精神魅力,显露出不同于其他类型儿童小说的题材魅力和审美吸引力;那种“超越日常生活,给儿童呈现更为广阔的世界和人生的书写”,赢得了众多少年儿童读者也包括家长们的广泛青睐。

的书信往来,将浩瀚的海洋与河流环绕的南方水乡连接起来:一头是在严酷孤寂的珊瑚礁上用生命和热血保卫祖国海疆的军人,一头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的质朴、纯真的孩子。作家将碧海岛礁上的英雄故事包裹在少年儿童的成长叙事中,日常生活与军旅生活双线并进。后者,则是采用了双重叙事角度(一是儿童黄豆的限制性视角,一是全知视角),使得作品的内在结构更加丰富饱满。

军营生活题材的引入,实现了儿童小说在生活内容、艺术手法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尤其是,碧海岛礁、大漠孤烟、雪域高原的军旅生活,是对少年儿童固有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和补充,极大丰富了他们对生活、生命的体验和想象。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读者有其对文学作品阅读、接受和欣赏的独特要求。儿童文学的审美本质,与儿童的思维特点、儿童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丰富的故事性、对叙事节奏的恰当把握、鲜明的人物形象等等。简洁、单纯、有力的叙事手法,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儿童阅读群体的语言方式是描述性的、具体的、感官式的,所以,写给他们的叙事作品应以描述性语言为主。作家们应在作品的生动性、可读性与文学性、艺术性之间求得平衡。

同时,儿童小说写作,需要作家拿出真正具有童年生命质感的作品。儿童视角往往意味着成人理性和经验的疏离,是从儿童的心理和情感出发来感知外在世界。作家唯有可能贴近儿童生命的核心,浸润着成人对童年生命的关怀,充分观照儿童内心的自由、愉悦与释放,才能寻找到儿童最本真的生命形态。“艾齐很想去看望南沙爸爸……在艾齐看来,竖河街之外那些他没去过的地方都是很远的地方。远方和远方,应该相隔不远吧,就像星星们都扎堆住在天上,到达一颗星星,就很容易到达一颗星星。”比如,《风筝是会飞的鱼》中这段关于儿童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就是洋溢着童心童趣的文学表达。张子影的小说《飞机楼》(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1年)讲述的是,女孩小竹和妈妈跟随飞行员父亲换防到边陲飞行团。父亲飞行员身体力行地教会孩子们使命与担当,飞机楼里的家属也用信任与支持,为蓝天骄子撑起爱的天空。作品坚守儿童本位,再现了空军大院特有的生活细节,充满童趣和生活质感。

二

儿童文学中始终隐藏着成人视角,成人和儿童两大主体对话交流的逻辑构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支点。成人作家如何通过自我的阅历和情感体验,形成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与扩展,是儿童文学写作的核心要义。近年来,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创作逐渐形成热潮,尤其是优秀军旅作家的“加盟”使得精品佳作不断涌现。从《冰山打鬼子》(1937·少年夏之秋)《走出野人山》《少年歇停营》,到

《火印》《少年的荣耀》《永远追随》《将军胡同》《野蜂飞舞》,再到最近一两年出版的《渡江少年》《最后的比分》《鸣鹤》《琴声飞过旷野》等小说,提升了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数量和质量,也极大丰富了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内涵。

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对当下题材的书写,并不一定等同于现实主义的写作范畴。现实主义写作,更多地指向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现实主义精神要求作家将历史与现实的艰难、困苦、磨砺转化为奋争、理想、信念,用充满信心灵辩证法与美学张力的文学作品来还原、升华现实人生,从而使文学创作具备崇高的精神价值;及时捕捉和表现巨变时代的基本走向,发现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描绘历史巨变给社会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民众的命运变迁。而革命历史题材,正是一种典型的充盈着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写作。

近年来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注重回归历史现场,回归儿童的本真个性。同时,这一批儿童小说,试图突破战争题材小说的常规模式,立足儿童本位,让“战争”与“儿童”两个元素更为契合。它们不是直面战争现场,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努力接近战争中儿童的更为真实和普遍的生活状态。

当儿童人物以一种未经成年人理性“锤炼”的直接方式对战争做出反应时,就有可能脱离战争历史言说的传统话语和成人语境,完成对战争、战场与历史的重新审视与书写。儿童视角基于“儿童性”的叙事伦理,在淡化战场的残酷与血腥之时,也避免了集体记忆裹挟下对童年记忆和情感的遮蔽,丰富着我们对战争历史与苦难的记忆。这是历史维度的童年书写,也是以童年视角构建历史。

在极致的苦难与伤痛中,童年精神迸发出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些最纯真最坚定的信念,那些最柔软最美丽的希望,更是童年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这些作品展现了革命历史环境下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图景,从儿童个体叙事的角度,再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儿童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精神。比如,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希望出版社2014年),写的是抗日战争中,山东乡间几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我们从中看到了战争对童年的伤害,也看到在战争摧残下,中国民间正义力量的生长;黄蓓佳的《野蜂飞舞》(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讲述的是中国抗战大背景下,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五校西迁”,女孩黄橙子跟随着家人离开南京,一路艰苦流徙,战争迷雾笼罩下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困苦与苦涩,离殇中相携相扶的经历却让她这段岁月变得耀眼而绚烂……从这些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开阔、温润的家国情怀和入道主义精神。

有的作品赋予少年儿童以战士的身份,让他们直面战争。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品注意到,虽然他们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少年儿童,但他们始终是战争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有脆弱、迷惘的一面,但最终

在战争与炮火、血与泪中实现了成长。

比如,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以儿童战士小虾米为主人公,以一种“向死而生”的惨烈与悲壮,表现绝境中人的脆弱与不屈;薛涛的《冰山打鬼子》(青岛出版社2017年),以抗联少年营小战士满山的视角、经历和成长,聚焦战火里的童年精神和人性光芒;张品成的《最后的比分》(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则以儿童作为目击者和表述者,讲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足球运动逐步在九堡镇开展,不同背景、行业的人的命运由此被小小的足球联系在了一起。而足球之外,一场关于“主义”的比赛,也逐渐分出了胜负。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明天出版社2022年),是作者创作的首部儿童长篇小说,透过历史的烟尘,讲述了韩子路、秋子等一群民间戏班的孩子,在战争年代中成长为少年文艺战士的传奇故事。由于作家对豫皖苏区的历史和地理人文风貌较为熟稔,作品传达出了更为具象的时代信息和历史意蕴。

三

在笔者看来,历史与人文,应该是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书写的双重维度。

从历史的层面看,小战士的形象,被赋予的是国家精神的内涵与担当,不可因为儿童文学的“儿童性”,而抹杀战争的残酷与正义;同时,也不能因为要写“战争中的儿童”,而忽略小战士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的意志与勇气,和他们面对残酷战争时的成长。

从人文的层面看,战争中的儿童毕竟是无辜的受害者,应从人文的理念出发,表现战争环境中儿童真实的性格、心理和成长。战争题材儿童小说是一种人性关怀叙事,要在极致的苦难与创伤中,展现童年精神——无论如何残酷与苦难,都不能扼杀孩子内在生命里对欢欣和快乐的渴望。而这种乐观和勇气,正是来源于童年对“善”和“美”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坚守。

成人的战争小说,往往会渲染战火之下死亡的惨烈,以此呈现战争的恐怖与残酷,也凸显作为正义一方的英勇和誓死赴国难的气概;但写给儿童的小说,基于“儿童性”的叙事伦理,在表现战争的严酷与惨痛时,不能过分强调暴力、恐惧、血腥所带来的恐惧感和压迫感。同时,让儿童主人公在战争中活下来,也是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坚守的底线。作家有责任为儿童们保留对生命和生活最基本的希望,这也是作品“儿童性”的一种表征。

当然,儿童视角的存在,在遮蔽和过滤掉一些信息之后,会留下一些认知战争和历史的空白。成人作家要在客观叙述中正面引导儿童面对战争与苦难时的情感和态度,让人物视角与儿童视角处于沟通对话的状态,有效扩展叙事作品的思想和情感容量。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樊希安的长篇小说《黄金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是作者继《乌蒙战歌》《兵山劲歌》《鹏城飞歌》“不灭军魂三部曲”和《十一中队》之后,又一部反映原基建工程兵部队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

樊希安“不灭军魂三部曲”的人物和故事具有连贯性。《十一中队》围绕一个连队在大队撤走后被留下来独立执行矿井施工任务展开叙事,谋篇布局精妙,情节设计“抓人”,读起来也很有趣。《黄金团》则以《十一中队》的结尾开篇,6年后建成大金矿进入尾声。从荒凉艰苦的镜铁山来到风光绮丽的三山岛,虽然环境变了,任务变了,体制和隶属关系也变了,但多数人物、人物关系和内部管理机制基本没变。小说的视野开阔了,关系复杂了,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

作者注重细节描写和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在全书16章中,几乎每一章都有一两个矛盾冲突和化解的情节。这里仅举3例。一是围绕大队要不要提前向三山岛集结和做好开工准备的问题。在十一团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明显存在“激进派”和“稳健派”的分歧。正当先遣组千方百计组织部队、企业和民工日夜奋战,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提前做好了“五一”前迎团部机关和大队进场的准备工作时,上级却因故推迟了全团集结于三山岛的时间。最后在“八一”前,所有部队才开进三山岛,包括那些曾持有反对意见的干部看到新区生产生活的良好环境和发展前途,消除了顾虑。“搬迁之争”才峰回路转。二是参谋长牛幸娃作为先遣组组长,为了支持政委和团长的工作,自告奋勇让自己的妻子第一个调离团部到三山岛先遣组上班。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因工作没有做到“到家”,不仅遭到“反对者”的讽刺攻击,而且让妻子发生误解。如果不是战友从旁耐心劝解,好事险些变成坏事。三是牛幸娃在指挥开掘海底巷道中两次因带头排除险情而遇险。第一次因抢救及时“大难不死”。但在矿井突遭海水倒灌即将淹没机房且发生漏电的危急时刻,牛幸娃奋不顾身一脚踢开了战友,自己却被电击牺牲。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这种主动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英雄壮举,绝不止牛幸娃一人。这样的情节绝非编造,英雄的形象永留人间。

一部小说能否成功,关键看人物的塑造。《黄金团》不仅人物众多,而且形形色色,各具特点,有棱有角,性格突出。在这些人物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3个层次的代表。一是从最基层成长起来的牛幸娃和他的搭档王永学。这对搭档一武一文。一个性格刚烈,一个沉稳干练;一个处处冲锋在前,一个注重以身作则。但他们又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战士高度关心和认真负责。因而尽管二人性格迥异,却能够真诚团结,合作共事,到哪都能把队伍带得“嗷嗷叫”。这是部队基层领导干部的常态,可信、可爱。二是团政委苏继轩,团长梁占刚。老资格的苏政委政治素养高,实践经验丰富,大局意识强,模范作用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争功不诿过。特别是他在意识到某项举措造成负面影响时,主动请求处分。在与团长以个人名义联名向上级机关请求保留

所部队的意见时,主动签名在前并亲自起草报告,充分体现出一个政治干部勇于担当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比苏政委小十来岁的年轻团长梁占刚,政委在位时主动支持和尊重政委领导,但敢想敢干,不等不靠,对下属和部队要求严格,关键时刻指挥靠前。苏政委调离任,由团长主持团党委工作后,梁占刚更是像老政委一样谋全局,抓大事,经常蹲在一线带领部队排除险阻,保障金矿施工安全顺畅运转。特别是在南关井保卫战中,正在主持党委会的梁占刚接到险情报告,当即中时会议,火速赶往现场指挥抢险。关键时刻,梁团长二话不说跳进水中,其他干部战士也紧跟其后,最终保住了巷道和设备的安全。这种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精神,正是我军在危急时刻能够众志成城、排除艰难险阻的法宝。三是指挥部初副政委和新任党委书记齐锐新两位“老八路”不顾年老多病,献身国家黄金事业的精神,可钦可敬。正是有老红军和老八路的传帮带,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才代代传承至今。

《黄金团》塑造的所有英雄人物,包括众多不知名的普通战士,他们并非完美无缺,有的甚至还犯过错,但后来认真改正并获得了进步,他们共同组成了英雄群像,十分可信也非常可爱。没有广大官兵的无私奉献,没有他们的埋头苦干,没有他们的锐意进取,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汗和英勇牺牲,就不会取得那么多建设成就和丰功伟绩。樊希安满怀诚挚的真情和感动的泪水创作《黄金团》,唱响了一曲金色的壮歌,将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传递得更久更远。

唱响金色的壮歌

——评樊希安长篇小说《黄金团》

■吴进华

似乎容不得这个英雄人物有一点闪失,有一点失败,甚至最后连婚姻也是圆满幸福。我以为,他这样写的目的,就是要把英雄主义聚焦、聚力到一个人身上,让读者获得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当然,这也是网络小说的一大特点。

《重卡雄风》曾在阅读平台连载,持续更新互动,获得百万读者阅读好评,先后获评为2020年度“中国好书”,入选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列入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推优名单。今天,我们阅读这样一部作品,赞颂中国工业在艰辛曲折中迎难而上、勇于改革,由弱变强直至成就中国制造佳话的历史和时代业绩,唤起我们对热血沸腾的英雄主义的致敬和追寻,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途上,我们需要更多的像林超涵这样的国家脊梁、英雄人物,以激励人们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书写新的时代华章。

《重卡雄风》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林超涵大学毕业后回到军工企业西汽,与一班人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发7吨重卡,并通过高原试车,在部队得到应用;接着又通过考察,发现民用市场巨大潜力,建议西汽转战民用卡车市场;西汽通过转型改制,自主创新进行二次创业,最终由弱变强,击败国外竞争对手,成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最后不断攀登,向10吨重卡进军。小说的时间跨度达二三十年,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中国工业化改革、创新、腾飞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有企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基础,但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已经是“老态龙

英雄叙事的时代交响

■汤伏祥

在中国文学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曾经有着光荣的传统,也曾一度式微。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发展日新月异,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不小的提高。近读晨枫的《重卡雄风》(海峡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更是让我看到了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崛起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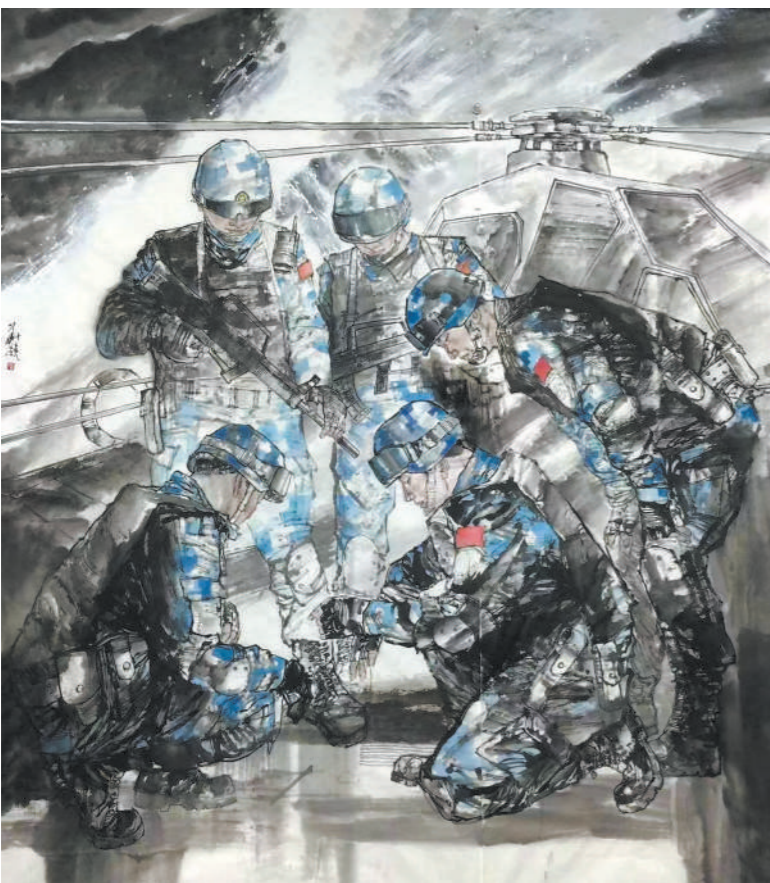
《重卡雄风》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林超涵大学毕业后回到军工企业西汽,与一班人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发7吨重卡,并通过高原试车,在部队得到应用;接着又通过考察,发现民用市场巨大潜力,建议西汽转战民用卡车市场;西汽通过转型改制,自主创新进行二次创业,最终由弱变强,击败国外竞争对手,成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最后不断攀登,向10吨重卡进军。小说的时间跨度达二三十年,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中国工业化改革、创新、腾飞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有企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基础,但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已经是“老态龙

钟”,停滞不前。此时的国企,尤其是工业化企业,需要一场阵痛和改革。《重卡雄风》通过讲述西汽的濒临破产,讲述林超涵等人的拼搏奋斗,绝地反击,将西汽的生存、崛起、改革与当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联系起来,揭示工业化发展的深层规律,书写了中国当代工业艰辛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重卡雄风》写的是军工西汽的成长壮大历史,同时也是写中国当代工业史,它是中国当代工业进程的缩影和生动再现。

写历史,最终是在写人物,也因为有了可敬可感的人物,历史才越发生动、厚重。《重卡雄风》中的林超涵,以及和他一起拼搏的厂长林焕海、副总郭志寅、销售徐星梅等,他们在各自的角色中,通过不懈的努力以及人格魅力,为中国工业的改革突围、创新发展谱写了壮丽的时代画卷。这些人物具有时代的典型性,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

《重卡雄风》中的林超涵富有智慧和勇气。他大学毕业,对专业有研究,热爱钻研技术;他年轻,充满朝气,从一



演习之前

(中国画) 彭华竟作

长征

第5481期

